

改变中国的 755——安史之乱爆发因果的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樊泳泽

摘要 解释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的流行说法“杨国忠逼反安禄山”实则不符合历史事实，与太子的见面早已决定了安禄山的反叛，而杨国忠的作用只是加速叛乱的到来。在以契丹族势力为代表的东北部狩猎农耕社会崛起时，作为中原王朝的统治代表，安禄山采取高压和挑衅的手段，使得东北游牧民族对内地中原王朝产生了不信任，最终走向敌对，由此广泛意义上的“安史之乱”可以视作内地农耕社会与东北狩猎农耕社会对抗的先声。因为扩张的继续被安史之乱斩断了可能，内地与北方民族势力强弱又在此时易位，唐前期的兼容与开拓的胸怀荡然无存，安史之乱后的汉民族心态走向排外，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又进一步影响了其后宋、明两个“华夏王朝”势力的发展。公元 755 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深刻改变了中国。

关键词 安史之乱；安禄山；华夏王朝；排外心态

引言

天宝十四载，公元 755 年，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掀起改变唐王朝乃至之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安史之乱”。本文将就“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和后期影响两个方面展开探讨，反驳和纠正既有的不合理的解释，提出补充和延伸的观点。关于这场叛乱爆发的原因，有一种影响甚大的既成解释即“杨国忠逼反安禄山”，本文就此论展开探讨，通过对安史之乱的主要史料文献的列表对比梳理和前后形势分析，力图揣摩安禄山走上造反的心路历程，以此证明“杨国忠逼反安禄山”之说不合理的，并且进一步指出杨国忠的作用实际上只是加快了叛乱的来临，是“催”而非“逼”。在安史之乱的后期影响问题上，笔者有两点补充，一是安史之乱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主线从内地农耕社会与蒙古高原牧业社会的相互关系向内地农耕社会与东北狩猎农耕社会的相互关系转变的先声，二是安史之乱打断了唐朝扩张的脚步，使中原王朝汉民族的心态走向排外和内敛，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之后两个“华夏汉人王朝”宋与明的势力范围。

1 渔阳鼙鼓怎地来——论“杨国忠逼反安禄山”

1.1 必反无疑

安史之乱无疑是以安禄山为发动者的谋反叛乱，这是根据事实来看铁板钉钉的结论。关于安禄山因何谋反，尤其是因何在公元 755 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造反，史学界有一种解释，即“杨国忠逼反安禄山”。这种解释大致的意思是，由于日益显赫跋扈的军政界对手安禄山对自己权威构成了威胁，杨国忠采取了一系列以说服唐玄宗相信安禄山图谋不轨，应当早做处理为目的的措施。杨国忠一方面想尽办法搜集安禄山的造反证据即“反状”，一方面

试图激怒安禄山，逼得他将“反”付诸实践，以此向玄宗皇帝显示自己的“先见之明”，增强玄宗的宠信。最后的结果，是在杨国忠的“咄咄逼人”下，安禄山真的在公元755年发动叛乱。由此，学界有说法提出安禄山的反叛是杨国忠“逼”的，这种说法在学界和大众的表述中并不少见，有时甚至是习惯性的。笔者在此认为，这种字面说法不合史实，或者说，只是部分地反映史实。现作以下讨论。

首先，安禄山的“反心”由来已久，也证据确凿。《旧唐书》载：“禄山阴有逆谋，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积谷为保守之计，战马万五千匹，牛羊称是。”¹《新唐书》亦言：“更筑垒范阳北，号雄武城，峙兵积谷……畜单于、护真大马三万，牛羊五万。”²可见他早就在准备叛乱的物质资源。除此之外，还“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数百”。³如果说筑雄武城可能真的是单纯的“外示御寇”，豢养私兵和培植恩信也不过是中晚唐时藩镇节度使积攒个人地方威望的通用伎俩，安禄山只不过是先声，有可能只是想优沃一方，未必要“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话，那么“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羣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遂令羣胡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⁴就已经是赤裸裸的“不臣之心”，何况这样的准备还“已八九年矣”。如果说这还是在小心思上的“不臣”和天高皇帝远的过瘾，那么在客观上注定了安禄山必反的，则是天宝六载进京与尚是太子的肃宗的会面。

安禄山在长安时，“（玄宗）命见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禄山拱立曰：‘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不得已，然后拜。上以为信然，益爱之。”⁵

此时的安禄山对于玄宗的谄媚讨好已经几乎是下意识的了，然而出身胡族、长在边旅、领兵驻外的他显然对于中华帝国宫廷朝堂的心思与秩序还经验不足，摆在他面前的是现任皇帝与储君太子，可以说不论向哪边倒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与太子走得太近无疑会招致现任皇帝的不满，过度排斥储君则更能预料得到不远的将来必定没有好果子吃。

可以作为例子是李林甫。由于之前在立储问题上站错了队，李林甫在肃宗成为太子之后想尽办法暗地里向肃宗下手，企图扳倒储君。显然他是知道，未来一旦肃宗承继大统，他必定没有好下场。幸运的是他在玄宗时代就已经一命呜呼，没有活到肃宗继位，但是从肃宗刚一登基就恨不得立刻将李林甫挫骨扬灰来看，二者的矛盾是毋庸置疑的。

回到安禄山的这件事来，可以想象得到在安禄山和玄宗面前，肃宗有多么尴尬，相应的，就有多么记恨安禄山。⁶事实上，安禄山自己在事后就意识到了，并且因此决定造反。《安禄山事迹》即明言：“（安禄山）尝以曩时不拜肃宗之嫌，虑玄宗年高，国中事变，遂包藏祸心，将生逆节。”⁷《新唐书》也认为，在这次面圣之后，“繇是禄山有乱天下意，令麾下刘骆谷居京师，伺朝廷隙”。⁸而这时候，还是李林甫独揽大权的时代，杨国忠还未攀到上层。可见，在杨国忠“逼”之前，安禄山就已经走上叛途了。

到这里再回头看两《唐书》将筑雄武城贮兵器、积谷养战马牛羊的事记在天宝六载之后，而安禄山见太子的时间《新唐书》记在天宝四载之后、天宝六载之前，《资治通鉴》和《安

¹ 《旧唐书》卷200《安禄山传》，第5369页。

² 《新唐书》卷225《安禄山传》，第6414页。

³ [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⁴ [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⁵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7页。

⁶ 《新唐书》即记载肃宗后来和杨国忠一起向玄宗进言，称安禄山必反。

⁷ [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⁸ 《新唐书》卷225《安禄山传》，第6413页。

禄山事迹》均记在天宝六载正月，笔者认为有理由怀疑二者的因果联系。

与肃宗的见面决定了安禄山走向造反的道路。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趁肃宗未继位之前，尽可能获取更多的利益。因为他的荣华富贵全都来自当朝的玄宗，玄宗多在一天，安禄山即可多获利一点，也就为造反多聚一点资本。而玄宗宾天之日，就是他在现行体制内的巅峰之时，更是叛乱行动的开始之时。

渔阳鼙鼓，已经是箭在弦上。

点燃导火索的，就是杨国忠。

1.2 回到 755

根据对安史之乱的过程记述较完备且时间较早的四本史书，即两《唐书》、《安禄山事迹》、《资治通鉴》，现将安史之乱爆发前，主要是天宝十三载至天宝十四载中，关于杨国忠“逼”安禄山及安禄山准备叛乱的动向列表如下。

	《旧唐书》	《安禄山事迹》	《新唐书》	《资治通鉴》
天宝十二载 (753 年)	玄宗使中官辅璆琳觐之，得其贿赂，盛言其忠。国忠又云“召必不至”。			
天宝十三载 (754 年)	正月，谒于华清宫，因涕泣言：“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玄宗益亲厚之。以为左仆射，却回。其月，又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奏吉温为武部侍郎、兼中丞，为其副，又请知总监事。既为闲厩、群牧等使，上筋脚马，皆阴选择之，夺得楼烦监牧及夺张文瓘马牧。	正月四日，入觐于行在。赐锦彩缯宝钿万。及见玄宗，涕泣而言曰：“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禄山以玄宗不疑，促驾朝见。 九日，加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与一子三品官，一子五品官，奴婢十房，各庄宅一所。二十四日，加闲厩、苑内、营田、五方、陇右羣牧都使，度支、营田等使，以御史中丞吉温为之副。温加武部侍郎，为之副使。二十六日，加兼知总监事。超授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三一作二千余人。 禄山归范阳，玄宗御望春亭送别，脱御服以赐之，禄山受之，惊惧不敢言。自谓显蛔，恐复留之，遂疾驱出关。	来谒华清宫，对帝泣曰：“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以不次，国忠必欲杀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书左仆射，赐实封千户，奴婢第产称是，诏还镇。又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表吉温自副。其军中有功位将军者五百人，中郎将二千人。禄山之还，帝御望春亭以饯，斥御服赐之。禄山大惊，不自安，疾驱去。至淇门，轻舡循流下，万夫挽絙而助，日三百里。既总闲牧，因择良马内范阳，又夺张文	正月，己亥，安禄山入朝。是时杨国忠言禄山必反，且曰：“陛下试召之，必不来。”上使召之，禄山闻命即至。庚子，见上于华清宫，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上怜之，赏赐巨万，由是益亲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上，上不听。安禄山求兼领闲厩、群牧；庚申，以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禄山又求兼总监；壬戌，兼知总监事。禄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温为武部侍郎，充闲厩副使，杨国忠由是恶温。禄山密遣亲信选健马堪战者数千匹，别饲之。 二月，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禄山欲反，故先以此收众心也。

	三月一日，归范阳，疾行出关，日行三四百里，至范阳。	三月一日，禄山将拜官也，玄宗以宰相处之，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垪草诏。既而杨国忠谏曰：“禄山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中国。”乃止。	僇马牧，反状明白。	三月，丁酉朔，禄山辞归范阳。上解御衣以赐之，禄山受之惊喜。恐杨国忠奏留之，疾驱出关。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执绳板立于岸侧，十五里一更，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
天宝十四载 (755年)	玄宗又召之，托疾不至。赐其子婚，令就观礼，又辞。	五月，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以代汉将。宰相杨国忠、韦见素相谓曰：“流言禄山蓄不臣之心，今又请蕃将以代汉将，其反明矣。”乃请见陈事，既见未对，玄宗先告曰：“卿等疑禄山反。”国忠等遽走阶下，垂涕具陈禄山反状，国忠以禄山表留于上前而出。俄又令袁思艺宣旨：“此一度姑容之，朕徐为图耳。”国忠等乃奉诏。及国忠见，无不悬论其事，国忠曰：“臣画得一计，可镇其难，伏望以禄山带左仆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翔为河东节度使。”上许草制，未行。上潜遣中使辅璆琳送甘子于范阳，私候其状。璆琳受赂而还，固称无他，其制遂寝。 后禄山数诈称破奚、契丹，所获驼、马、牛不可胜纪。国忠因令门客蹇昂、何盈以求禄山阴事，命京兆尹李峴围捕其宅，得李起、安岱、李方来等，皆令侍御史郑昂之阴推劾，潜缢杀于御史台，又贬吉温为澧阳长史。无何，安禄山上表以理，且言国忠谗疾之状。玄宗方宠于将相，故两存之。庆宗尚荣义郡主，供奉在京，密报其父，禄山闻之怒，命严庄上表以自理，且	国忠谋授禄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召还朝。制未下，帝使中官辅璆琳赐大柑，因察非常。禄山厚赂之，还言无它，帝遂不召。未几事泄，帝托它罪杀之，自是始疑。然禄山亦惧朝廷图己，每使者至，称疾不出，严卫然后见。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阳，再旬不见，既而使武士挟引，无复臣礼，士淹宣诏还，不敢言。帝赐庆宗娶宗室女，手诏禄山观礼，辞疾甚。	二月，辛亥，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韦见素谓杨国忠曰：“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见素当极言；上未允，公其继之。”国忠许诺。壬子，国忠、见素入见，上迎谓曰：“卿等有疑禄山之意邪？”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上不悦；国忠逡巡不敢言，上竟从禄山之请。他日，国忠、见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今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为河东节度使，则势自分矣。”上从之。已草制，上留不发，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琳受禄山厚赂，还，盛言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上谓国忠等曰：“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藉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事遂寝。 四月，安禄山奏破奚、契丹。安禄山归至范阳，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称疾不出迎，盛陈武备，然后见之。裴士淹至范阳，二十余日乃得见，无复人臣礼。杨国忠日夜求禄山反状，使京兆尹围

		陈国忠罪状二十余事。玄宗惧其生变，遂归过于京尹李岷贬零陵太守。以安之。六月，玄宗使黜陟使分行郡县，给事中裴士淹恐惧，不敢归，禄山乃见之。禄山自归范阳，逆状渐露，惧朝廷诛之，使者将至，辄称疾不迎，严介士于前后，成备，而后见之。士淹之至也，亦如之，令武士引入，无复人臣之礼，士淹宣旨而退。		其第，捕禄山客李超等，送御史台狱，潜杀之。禄山子庆宗尚宗女荣义郡主，供奉在京师，密报禄山，禄山愈惧。 六月，上以其子成婚，手诏禄山观礼，禄山辞疾不至。
		七月，禄山又请献马三千疋，鞍辔百副，每疋牵马夫二人，令蕃将二十二人，部送载物长行，车三百乘，每乘夫三人。河南尹达奚珣上奏阻止，玄宗稍悟。扑杀辅璆琳。遣中使召禄山曰：“与卿修得一汤，故令召卿至，十月朕御于华清宫。”兼宣如达奚珣之策。禄山闻命曰：“马不进，亦得十月灼然入京。”承威复命，奏泣曰：“臣几不得生还，禄山闻臣宣先奏旨，踞床上不起，但云圣人安稳。遽令左右送臣于别馆，居数日，然后得免难。”	献马三千匹，驹鞍自倍，车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袭京师。河南尹达奚珣上奏阻止。帝赐书曰：“为卿别治一汤，可会十月，朕待卿华清宫。”使至，禄山踞床曰：“天子安稳否？”乃送使者别馆。使还，言曰：“臣几死！”	七月，禄山表献马三千匹，每匹执控夫二人，遣蕃将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达奚珣上奏阻止，上稍寤，始有疑禄山之意。会辅琳受赂事亦泄，上托以他事扑杀之。遣使诏谕禄山，如策；且曰：“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神威至范阳宣旨，禄山踞床微起，亦不拜，曰：“圣人安稳。”又曰：“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馆舍，不复见；数日，遣还，亦无表。神威还，见上泣曰：“臣几不得见大家！” 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会有奏事官自京师还，禄山诈为敕书，悉召诸将示之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众愕然相顾，莫敢异言。
	十一月，反于范阳。	十一月九日，禄山起兵反。	十一月，反范阳。	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

表 1：<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前主要史料记载列表 >

顺着时间表读下来可以发现，在天宝十四载正月面圣之后，安禄山就再也叫不过来了。这一次他来长安，就已经知道玄宗的召唤背后是杨国忠的撺掇，他已经意识到背后的凶险，所以从此绝不再来。“自归范阳，逆状渐露”⁹，谋反也已经箭在弦上。

在这次近乎仓皇逃命地出关离京之后，他凭借着玄宗的信任最后捞了一把，同时也是最

⁹ [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22 页。

实惠地捞了一把：领闲厩、群牧、兼知总监事；收选健马数千匹；手下将士加官进爵。天宝十四载，他最后一次杀鸡取卵式地邀宠，成功“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以代汉将”¹⁰。而这一举动，彻底刺激了杨国忠的神经，他提出授予安禄山宰相头衔，从边疆调回中央，实际上是变相剥夺军权，让安禄山有名无实，明升暗贬。然而这一着棋因为安禄山成功地贿赂使者使玄宗最终不再怀疑而化为乌有，同时也释放了杨国忠与安禄山更加激化的矛盾信号。

计划失败的杨国忠此时已经失去了理智，以至于不择手段和不留余地。他拔掉了安禄山在长安的眼线。这一消息传回范阳后，安禄山知道已经再无回旋的余地，终于开始将叛乱付诸实践。他的第一套计划是通过献马偷袭长安，但是被河南尹达奚上奏阻止。这不仅仅是第一套方案的失败，更起到了打草惊蛇的作用，使得玄宗因此起了疑心。这时候正巧辅琳因受赂的事情被揭发而被杀，玄宗派人招他十月赴京，安禄山按兵不反的最后牵挂——有利可图的现任皇帝玄宗——也没了。

终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渔阳鞞鼓动地来。

至此，关于“杨国忠逼反安禄山”说法的讨论也可以做一个结论。在得罪太子前安禄山也许还只是有“不臣之心”，但见太子之后就是实实在在准备称兵向阙了。现在的荣华富贵来自玄宗，未来的皇帝已经不对付，再加上有了称兵之心他本就是惊弓之鸟，杨国忠一次次的刺激只会加速他的谋反¹¹。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到，杨国忠的进言和措施确实起到了警醒玄宗的作用，然而不幸的是，这恰恰让叛乱提前到来。如笔者前文所述，安禄山在见太子之后仍臣服于朝廷，目的在于更多地从玄宗处获取利益，然而此时玄宗已然对他起疑，臣服玄宗已经得不来任何好处，肃宗继位后又是可以预见的未来，那么叛乱的时机也就来了。755年就处在导火索的引线上，杨国忠就是那点燃它的火星。

因此，站在杨国忠的角度上也许是“逼”，但从客观过程来看却是“催”¹²。“杨国忠逼反安禄山”的说法，可以休矣，因为它至多只是部分地（在杨国忠的角度上）反映了事实。其实，哪怕站在杨国忠的角度，以他搜集的那么多罪证，自己也早应该坚信安禄山必反。他只不过是借以亿万斯民和大唐盛世的劫难作为自己一片忠心的证明。

帝制下个人集权的可怕，由此也可可见一斑。

2 惊破何止羽衣曲——安史之乱的两个剧变性影响

2.1 东北与内地区域的对立

按吴松弟《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书中的划分，历史中国分为内地农耕社会、蒙古高原牧业社会、东北狩猎农耕社会、青藏高原牧业社会、天山以南农耕社会、云贵高原农耕社会这六大区域社会。在五代十国之前，内地农耕社会与蒙古高原牧业社会的关系是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长城沿线拉锯。五代十国之后，中国历史的主线转为内地农耕社会与东北狩猎农耕社会的关系。这一转变的转折时代是五代十国，而安史之乱恰恰就是五代十国的先声。安史之乱不仅葬送了盛唐，同时促使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时代，为五代十国的到来做了准备。

东北狩猎农耕社会中首先与内地对抗的主要代表是契丹势力。契丹引起中原王朝的关注

¹⁰ [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页。

¹¹ 《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是时，禄山已专制河北，聚幽、并劲骑，阴谋逆节，动未有名，伺上千秋万岁之后，方图叛换。……国忠使门客蹇昂、何盈求禄山阴事，围捕其宅，得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郑昂缢杀于御史台。又奏贬吉温于合浦，以激怒禄山，幸其摇动，内以取信于上，上竟不之悟。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第3245页。

¹² 《新唐书》卷206《杨国忠传》：“禄山虽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隐忍，伺帝一日晏驾则称兵。及见帝嬖国忠，甚畏不利己，故谋日急。”第5850页。

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的事情。契丹曾经一度与唐朝通好，接受赐姓，但在武周时代的后期，因武则天将精力主要集中在内政的建设和自身权力的巩固上，从而给了契丹离心的可乘之机。万岁通天元年，公元 696 年，契丹大举叛乱，但最终还是因战败而投靠东突厥。之后东突厥内乱，契丹于开元二年，公元 714 年再度归附大唐，首领李失活接受“松漠都督”封号。此后东北的局势相对稳定。到了天宝四年，公元 745 年，阻午可汗接受赐姓和“松漠都督”的封号。然而就在当年，阻午可汗麾下的契丹联盟“叛去”，而此时担任范阳节度使的，正是安禄山。¹³两条线索终于交汇在了一起。

契丹与中原王朝的对立与安禄山，或者说广泛意义上的“安史之乱”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作为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担负着镇守边疆、安抚融合不同民族、维持地区稳定等重大责任。然而他很清楚，这些事情做好了是应有之义，做不好则是渎职不尽心，安安分分工作不但换不来显著的回报，更会降低玄宗对东北及自己的关注。最好的办法，是东北的局势“按倒葫芦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皇帝和朝廷就会保持对东北和自己的重视，这样他一方面能从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利益，一方面朝野也不会因自己势力的不断做大而引感到不适，从而为叛乱作储备。而现成的素材，就是与契丹等族的关系。他想邀功请赏又不想真刀真枪，于是“前后十余度欺诱契丹，宴设酒中著茛菪子，预掘一坑，待其昏醉，斩首埋之，皆不觉死，每度数十人。”¹⁴这样做堪称一箭双雕，不但可以请赏，还能给朝廷释放一种东北局势不稳，经常发生冲突的假象。¹⁵

不幸的是，安禄山贪一时之利采取的手段，正不断地埋下民族仇恨的种子，造成东北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不信任与敌意。表面上看，安史叛军中的确有契丹等东北游牧民族，但是其中的大多数是他豢养的那“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的义子，这些义子是他以个人身份笼络来的，而谋杀酋长邀功却是以朝廷命官、封疆节度的身份。两者影响之轻重，性质之不同，一目了然。

阻午可汗的契丹反叛势力被安禄山带领的唐军击破，玄宗想要另封一位部落长楷落为“恭仁王”，接替阻午可汗对契丹的统治，然而楷落却已经自称“契丹王”，与唐朝分庭抗礼的独立态势已然明显。¹⁶此后，安禄山与契丹等族交战不断，契丹甚至在 756 年趁安禄山南下之际，突袭范阳。这一动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日后契丹对“燕云十六州”兴趣的先声。

在一个民族文化与中华传统差异尚大且正在新兴的时候，作为代表中原王朝与之接洽的地方统治代表，安禄山呈现出的统治表现，使得东北游牧民族对内地中原王朝产生了不信任、排斥乃至敌对的心态。这一点可以看作广泛意义上的“安史之乱”对东北狩猎农耕社会与内地农耕社会的关系乃至此两大地区此后长时间的历史演进产生的深远影响。¹⁷

2.2 “华夏汉人王朝”扩张的中断与排外的心态

天宝十载，公元 751 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通与南诏作战，大败，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与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作战，大败。八月，东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与契丹和奚人作战，

¹³ （日）杉山正明著；乌兰 乌日娜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87-88 页。

¹⁴ 《旧唐书》卷 200《安禄山传》，第 5369 页。

¹⁵ 同样的思路下，这次契丹叛乱，安禄山就故意反应迟钝，放纵契丹以恶化局势，《安禄山事迹》：“奚、契丹各杀公主，举部落以叛。禄山方邀功两蕃，肆其侵掠……”（[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3 页。）

¹⁶ （日）杉山正明著；乌兰 乌日娜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88 页。

¹⁷ 叛唐的阻午可汗是遥辇氏的第二代首领，是由实力派人物涅里拥立的，涅里一般被认为是《辽史》中所记完颜阿骨打的直系祖先雅里，这样梳理下来，我们甚至可以将契丹的勃兴与辽国的建立进一步上溯到安史之乱所造成的民族对立。

大败。大唐王朝先后在西南、西北、东北三个方向吃了败仗。

由于云南战事的失败被杨国忠以胜报败压下来回避淡化，高仙芝在战败后被调回长安，安禄忙于准备叛乱，唐朝在这三个方向都没有立即作出回击。不久之后，“渔阳鼙鼓动地来”，唐朝陷入巨大的内乱。

历尽艰辛平定叛乱后，唐在东北的控制有名无实，西北的势力一退再退。在东北，唐朝对安史叛军就地安置，设置的卢龙、成德、天雄三个节度使即所谓“河北三镇”都拒不服从中央。东北方向俨然割据。在西北，河西、陇右地区被吐蕃趁火打劫，甚至连长安都暴露在危险之下。到了公元 790 年，连初唐至盛唐几代皇帝辛苦经营的西域也丢了，安西北庭两都护府与中央失联，存亡未知，唐朝也无力重返，实际上放弃了西域。

巧合式的，在唐朝之后，传统史学认为的所谓“华夏汉人王朝”——宋朝、明朝，相比于汉唐来说，失去的正是对这三个方向尤其是西北与东北的有力控制与影响。¹⁸ 这两朝与非汉民族势力基本上都是划疆而治。如果再将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版图与宋明相对比就更能说明问题，三者的范围极其相似。这样看来，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元清两个“征服王朝”的入主中原，今日的中国会是怎样的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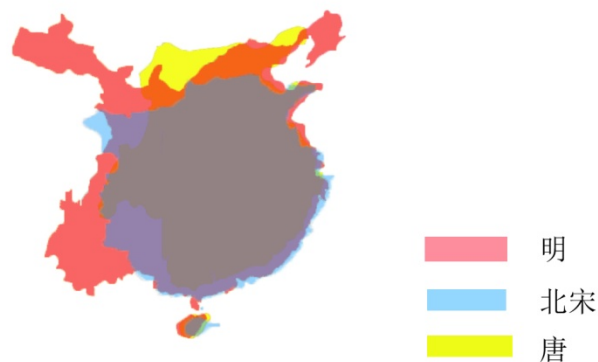


图 1：中晚唐、北宋、明控制范围叠加对比

那么，这之间的内在联系又如何解释？

关键在于安史之乱爆发节点和这场叛乱发起者的特殊性。下面就这两方面作细化的讨论。

首先，对于安史之乱爆发的时代背景，可从唐朝的内部统治与北方民族的势力变化两方面探讨。德裔美籍汉学家魏特夫将北族王朝划分为“渗透王朝”及“征服王朝”两种，与此相对的，剩下的王朝这里姑且可以称为汉民族建立的“华夏王朝”。而隋唐却既不是少数民族渗透中原建成的，也不是征服后入主中原，隋唐的建立者是混血儿，但坚决以华夏正统自居，尤其唐朝天子更兼具双重身份，既是中华天子，也是各族的天可汗。¹⁹因此，如果将唐朝也划入“华夏王朝”的话，那么这个“华夏王朝”在建立之初显然带有非汉民族的气质特征。以安史之乱为节点，前为初唐与盛唐，后为中唐与晚唐。从初盛唐到中晚唐正是唐朝这个“混血王朝”向“华夏王朝”转变气质的时期。随着科举制的“极于德宗之世”、两税法的颁布施行、庶族地主逐渐走向权力集团的核心，唐朝已经不仅在版图势力范围上，更在统

¹⁸ 北宋时，在西南的大理国俨然与世隔绝，东北方向连华北的燕云十六州都收不回来，西北更是连路上丝绸之路都走不通。明朝时，随着长城的筑成，明朝在西北的势力再未出嘉峪关，在东北则长期与满族对峙。

¹⁹ 此处表述借鉴易中天《隋唐定局》。

治架构上与宋明靠拢。而安史之乱和北方民族势力的变化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华夏王朝”的心态。

在北方，取代突厥称雄草原的是回纥。在怀仁可汗的领导下，九姓铁勒被统合起来，将蒙古高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不久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不得不拉下脸来向回纥借兵平叛。作为回报，唐朝承诺每年送给回纥两万匹绢帛。而回纥堪称“客大欺店”，在长安的回纥将士及商人的衣食住行都由唐朝的鸿胪寺担负开销，他们还在长安街头耀武扬威惹是生非。在平叛过程中，因为唐朝许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²⁰，使得回纥对百姓的残暴一点不比安史叛军差。宝应元年收复洛阳时，回纥甚至“肆行杀略”，以致洛阳“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再加上政府军也助纣为虐，百姓甚至“皆衣纸”。²¹此后回纥依仗着自己“平叛恩人”的身份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骚扰唐朝北方，还强买强卖把马匹运到唐朝，高价索要绢帛。有一次甚至要求唐朝出五十万匹绢购买两万匹马，唐朝实在拿不出绢帛，反复交涉才最终以半价了事。为了延续“绢马贸易”，与唐朝建立起更加牢固的对等关系，回纥要求唐朝下嫁公主而且全都是“真制公主”，即皇帝的亲女儿，以此获得巨额的陪嫁。²²回纥的得寸进尺和仗势欺人引起了唐朝君臣朝野的巨大反感，但是不得已只能隐忍。

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在黠戛斯的突然袭击下灭亡，不久后吐蕃也陷入内乱，自安史之乱后唐朝一直为之头疼的两大外部压力终于解除。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唐朝当局开始打压回鹘的国教摩尼教，毁坏其寺院、没收其财产，并且给摩尼教僧侣剃头，让他们穿上佛教的袈裟打扮成佛教僧人然后杀害。在唐朝的日本僧人圆仁记述道：“四月中旬，敕下，令煞天下摩尼师。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而煞之。”²³摩尼教是回鹘的国教，对摩尼教的大肆镇压可以看得出唐朝君臣对回鹘的积恨之深，终于等到报复的这一天。

对回鹘的态度并非个例，它代表了对“外族”的普遍排斥与反感。实际上，在对摩尼教的摧毁的同时，更加针对的目标是佛教，即所谓“会昌毁佛”，另外琐罗亚斯德教也作为邪教被摧毁。可见，在“会昌毁佛”运动中，作为打击目标的是几乎所有非汉民族宗教。这场运动背后的动力是唐朝国内的排外势力，会昌毁佛可以视作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²⁴这就联系到了第二个方面——安史之乱的发起者。

顾名思义安史之乱的两大主要人物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胡人”，安禄山是“杂种胡人”²⁵，史思明是“突厥杂种胡人”²⁶，而组成安史叛军的核心成员也正是那些“胡人”“曳落河”们。因此，这场叛乱不同于普通的暴动和夺权，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场动摇盛唐根基的叛乱是以“胡人”为主要发动者对中原王朝中央政权的挑战。这一点非同小可，它使得唐朝上下对“胡人”的信赖一落千丈，产生了极大的防范心，由此进一步影响了汉民族的心态，趋于排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指出，过度信赖“寒族胡人”，放心委以大将之任是酿成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²⁷。实际上，当时朝野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点，他们对手握重兵的“番将”尤其提防，仆固怀恩的故事就是极好的例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胡人作乱”的安史之乱打断了唐朝继续扩张的脚步，引起朝野对“番将”的极大不信任。北方草原上崛起的回鹘虽然对唐朝的平叛厥功甚伟，却因为仗势

²⁰ 《资治通鉴》卷220，第7034页。

²¹ 《资治通鉴》卷220，第7135页。

²² （日）气贺泽保规著；石晓军译：《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2-355页。

²³ 《入唐求法巡礼记》卷四，会昌四年三月条。

²⁴ （日）气贺泽保规著；石晓军译：《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0-332页。

²⁵ 《旧唐书》卷200《安禄山传》，第5367页。

²⁶ 《旧唐书》卷200《史思明传》，第5376页。

²⁷ 《资治通鉴》卷216，第6888-6889页。

欺人给唐朝朝野留下极差的印象。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了唐朝朝野的排外心态。

这种心态,在中唐诗词里同样找得到例证。以白居易和元稹两大代表性诗人的作品为例,在他们的诗中,但凡涉及社会上流行的“胡式”乐舞和妆容,几乎都是持批判和排斥态度。

关于胡旋舞,二人有诗如下:

胡旋女—戒近习也

白居易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飏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
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馀。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
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禄山胡旋迷君眼，
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
数唱此歌悟明主。

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胡旋女

元稹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
妖胡奄到长生殿。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
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
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吸笄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
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才人观者相为言，
承奉君恩在圆变。是非好恶随君口，南北东西逐君眄。
柔软依身著佩带，裴回绕指同环釧。佞臣闻此心计回，
荧惑君心君眼眩。君言似曲屈为钩，君言好直舒为箭。
巧随清影触处行，妙学春莺百般啭。倾天侧地用君力，
抑塞周遮恐君见。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

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

关于当时“胡人风格”妆容,二人有诗如下:

时世妆

白居易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
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
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
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
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
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

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

元稹

吾闻黄帝鼓清角，弭伏羲黑舞玄鹤。舜持干羽苗革心，
尧用咸池凤巢阁。大夏濩武皆象功，功多已讶玄功薄。
汉祖过沛亦有歌，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
作之军旅传糟粕。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侵淫易沉著。
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雅弄虽云已变乱，
夷音未得相参错。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
春莺啼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中可以看出，元、白二人将“胡旋舞”与安禄山这个“胡人”联系在一起，指责成蒙蔽圣聪、颠覆朝纲、乱人心术的洪水猛兽。受吐蕃等“胡人”非汉民族影响的妆容更是与“华风”格格不入的蛮夷样子。延伸一步说，这样的心态在与元稹、白居易同时的韩愈的文章中（如《谏迎佛骨表》）也有体现。这种心态，与唐太宗时代“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²⁸的胸怀，已是相去甚远。

因为扩张脚步的受阻以及内地与北方民族势力强弱的易位，再加上安史之乱以“胡人”为罪魁祸首，安史之乱后的汉民族心态走向排外，而这种心态又反过来影响了后来“华夏王朝”的外扩，使之控制范围趋于收缩。北宋一朝力求与北方民族相安无事，最多不过对燕云十六州动动脑筋，南宋则更是自顾不暇。到了明朝，随着工程巨大、质量极高的长城的最终完成，明帝国的势力就再也没有越出嘉峪关一步。甚至到了近代，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仍认为“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今者，中华民国虑未能复先汉之旧疆，要以明时直省为根本（除缅甸）。”安史之乱的影响，何其深远。

²⁸ 《资治通鉴》卷 197，第 6215-6216 页。